

中华文化学院文库

生命与人生

儒学与梁漱溟的人生哲学

■ 刘长林 / 著

开明出版社

Kai Mi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化学院文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编. —北京:开明出版社, 2000. 9
ISBN 7-80133-487-6

I. 中… II. 中… III. 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研究-文集 IV.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704 号

生命与人生——儒学与梁漱溟的人生哲学

著者 刘长林

出版 开明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印刷 保定市印刷厂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大 32 开 印张: 7.25 字数: 175 千字

版次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33-487-6/I · 23

定价 13.00 元

目 录

绪论 新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人生哲学的重建	(1)
第一章 究宇宙之元 决人生之疑	
一、宇宙本体“无性”论	(16)
二、出世间与随顺世间	(20)
三、中国人不应“佛化”	(25)
第二章 从人生路向看东西文化走向	
一、东西文化论战的缘起	(34)
二、从人生路向比较东西文化走向	(39)
三、对东西人生态度理解的偏失	(44)
第三章 中国传统人生态度价值的阐说	
一、从传统没有产生民主看	(57)
二、从传统没有产生科学看	(61)
三、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看	(63)
四、中国传统人生态度的价值与未来走向	(67)
第四章 孔子人生哲学的现代阐释和转换——与胡适比较	
一、孔子人生哲学与《周易》	(76)
二、孔子人生哲学的思想和认识方法	(78)
三、孔子人生哲学的根本要旨	(80)
四、孔子“仁”的人生哲学内涵	(83)
五、孔子人生哲学是否注重道德习惯	(86)
六、生活要不要问“为什么”	(88)
七、孔子人生哲学的本质特征	(90)

八、孔子人生哲学的宗教作用·····	(93)
九、从现代转换看胡、梁阐释的意义·····	(96)
第五章 构建“合理的”人生观	
一、“新青年派人生观”的不足：“找”·····	(103)
二、“生活者生活也，非谋生活也”·····	(106)
三、从“特殊的生活”到“人的圆满”·····	(109)
四、圆足人类的可能性·····	(114)
第六章 生命化的人性本善论	
一、人性本善：善本乎通，恶起于局·····	(121)
二、生命灵通，人生才能向善·····	(127)
三、复兴礼乐，使社会至善·····	(132)
第七章 涵育情感与人的解放	
一、李超事件与妇女解放问题·····	(137)
二、涵育情感是人的解放的积极道路·····	(140)
三、陈独秀对“涵育情感说”的批评·····	(144)
四、求男女之同反乎自然·····	(147)
第八章 “慎重”的人生婚姻观	
一、独身主义是否可取·····	(153)
二、婚姻制度是否必要·····	(154)
三、取何择婚的形式·····	(156)
四、能否离婚·····	(159)
五、家庭是人安身立命之地·····	(162)
第九章 对科学主义（人生观）的问难	
一、科学解决人生问题局限性的提出·····	(164)
二、科学受功利支配使情感疏离·····	(167)
三、科学运用于工业使人丧失生机·····	(173)
四、科学不能取代宗教·····	(175)
五、西方人正向孔子走来·····	(177)

第十章 伦理本位主义与人生安顿

- 一、伦理本位与人生安顿…………… (184)
- 二、互以对方为重…………… (186)
- 三、伦理本位与人生向上…………… (188)

第十一章 儒家圣贤人格的现代重构

- 一、解决“中国问题”需要贤者…………… (191)
- 二、现代“圣贤”人格的特征…………… (195)
- 三、“圣贤人格”的实现与价值取向 …… (207)

绪论 新儒家梁漱溟与现代 人生哲学的重建

以儒家人生哲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主要精神支柱，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在中国近代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动的背景下，这种稳定的状态便不复存在了。它面临着是否适应新的时代，是否适应新时期人们的精神要求，是否需要解构和重建的问题。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民族蒙受耻辱，中国人民奋起抗击外国侵略者，为维护民族和国家主权的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中，中国社会也开始由古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在经济上，传统的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经济结构开始向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过渡；在政治体制上，传统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主义专制政体开始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转型；在思想文化上，以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碰撞和冲突为契机，以思想革命和思想解放为突破口，对新的思想文化形态和结构的构建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和层面上展开，传统的中国思想文化开始全面向近现代型态转型。于是，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似乎完成了从封建专制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革命。

由于这次革命相对来得比较急促，传统的依靠政治强力维持的“三纲五常”等价值系统开始被打破，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信仰体系和价值系统并没有形成，各种价值意识自由增长着，而任何一种价值意识显然都无法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而成为社会规范。于是出现了民国前后的信仰危机，表现在传统的伦理道德

和价值规范虽说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和行为,但失去了神圣性。人们开始对这些价值系统怀疑、不满,在行动上甚至离经叛道。随着传统的君臣关系和社会角色的破碎,新的社会角色在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变得无所适从。有的人开始利用社会转型之机,极尽钻营之能事,不知廉耻,不顾他人和老百姓死活,满足一己的私欲;有的人或因生活艰辛,看不到人生的前途,或因对新事物、新观念不理解,走上苟且偷生、遁入空门、自杀之路者日益增多。虽然自杀或出家之人历代都有,但民国成立前后成了一个突出的、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① 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开始呈现为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正如辛亥革命失败后的熊十力说:“念党人争权夺利,革命终无善果。又目击万里朱殷,时或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②

对于这种因社会大动荡、大转型引起的信仰无着、人生无从安立的人生危机,有的研究者称为“意义危机”(the crisis of meaning)。张灏认为,生命与世界的根本意义经常是吸引人的问题。1895年后新的世界观和价值系统涌入中国,打破了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世界观和人生观之时,中国人陷入了严重的“精神迷失”境地。这种“精神迷失”具体表现为“道德价值的迷失”、“存在迷失”和“形上的迷失”三个方面。“意义危机”首先从“道德价值的迷失”开始。即儒家的一些重要的道德政治价值动摇了。到五四时期,当一些狂热者要求对所有价值,“特别是对儒家的道德传统,重加评估之时,迷失状态达到了极致”。^③紧接着出现了“存在迷失”,在广泛的讨论道德危机时,存在着对生存

① 参见齐卫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自杀现象》,《民国春秋》1998年第3期。

② 《十力语要》卷四,1947年湖北印本,第59页。

③ 周策纵: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59.

状况的焦虑和对生命存在的悲观意识。这种气氛弥漫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些作家的诗文中，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投入佛学的研究，就是想解决生命存在的意义问题；而更深层的是“形上的迷失”，即科学虽然为中国人开出了一条新路，“虽然能回答许多‘什么’（what）和‘如何’（how）的问题，可是对于许多‘究竟因’（ultimate why）却无法不缄默。因此，科学因本质之故，无法取代传统中广涵一切的世界观”。^①

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张灏关于造成“意义危机”原因的解釋，例如，他所说的五四彻底反传统，但他所说的这种危机确实存在。这场危机的实质是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受到了冲击，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开始动摇，价值取向变得无所适从，对人生意义和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变得迷惘所造成的。正如梁漱溟在解释很多人走向出世之路时所说：“十年来这样态度的人日有增加，滔滔皆是：大约连年变乱和生计太促，人不能乐其生，是最有力的外缘，而数百年来固有人生思想久已空乏，何堪近年复为西洋潮流之所残破，旧基骤失，新基不立，惶惑烦闷，实为其主因。”^②

因此，一些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和爱国者开始意识到，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国民的精神将无从安立，国民的精神凝聚力将被消弱，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将会延缓，要真正实现中国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使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在对社会制度进行彻底改造和革命的同时，必须进行彻底的思想革命。思想革命的重要方法是比较评判、价值评估和理论重建。通过比较的方法，运用新的价值尺度，对传统和外来价值系统进行

① 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当代新儒家》第59～60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② 《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3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重新估价，合于现代需要的则吸纳到新的价值体系和理论之中。对人的追求、人生所要达到的目的重新定位，对中国人的观念体系进行彻底的更新和改造，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进行现代重建。这是解除人们的信仰危机，确立对人生、对社会发展、对中国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建立信心的重要保证。中国近代思想革命形成一定规模的，首先是戊戌变法运动，其次是辛亥革命，而进行得比较彻底、深入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这三次大的运动，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思想革命，新的价值系统和信仰体系开始确立。

中国人生哲学的现代重建，始终是以新的理论武器为依据而展开的。在中国近现代的历次论战中，各种理论纷纷登场，展示各自理论的风采，以及解决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有效之处。进化论、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实验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自由主义等都有各自的市场。运用这些理论观察问题的思想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方克立先生认为，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形成了“对立互动”关系。虽然三派所选择的具体道路和所表现的形式不同，但“思想从起源来说就有很多共同点：他们所思考和企图解决的大体都是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引介西方、如何建设中国的新文化等问题；他们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共同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主题；他们都向西方寻求真理，但又都想避免西方文明发展所展现、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严重缺点；他们都希望中国走出新世纪，迈向现代化，在思想上都具有文化启蒙的性质和特点”。^①这一提法有利于澄清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及其变

^①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6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迁。具体到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现代转换和重建，这三大思潮的相互对立与推动也是很明显的。现代新儒家是在批评和回应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西化派人生哲学的基础上，以“重建儒家价值系统”、复兴孔子和儒家人生哲学为己任，针对现代社会在西方思潮影响下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为医治现代人欲横流之病，吸纳现代西方生命哲学和人文主义等思想成果，对传统儒家人生哲学进行现代阐释和理论重建的。他们比较深入、系统又具有现代性的论述，赢得了以维护民族文化为己任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赞同，从而开始与自由主义者及马克思主义者相抗衡。

梁漱溟（1893—1988）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和主要代表人物。他是通过批评陈独秀、胡适等人而登上中国现代学术舞台的。在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上批评西化派，在人生观上批评“新青年派人生观”，在理论上反对实验主义和唯物史观，提出人生三大路向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重新阐释了孔子和儒家人生哲学的恒常价值，主张中国的复兴要从复兴儒家和孔子人生哲学做起。他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朝话》、《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重要著作，比较深入的论述了他的人生哲学思想。由于他在五四时期的挺身而出，使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出现在中国现代思想舞台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以现代生命哲学和陆王心学相融合为特征的新儒家人生哲学思想。他开启了现代新儒家复兴传统儒家人生哲学的路，作为重建中国现代人生哲学的一派代表人物，丰富了现代有中国特色的人生哲学的内涵。

梁漱溟之所以能在重建现代人生哲学中以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出现，既有上述社会文化背景的原因，也与梁氏个人的独特经历相关。

首先，梁漱溟较早地感受到了西方的新文化，并能够以积极的心态接纳东西方文化，以平等的眼光和比较的方法看待各种文

化的价值，多元价值因素的吸取为他建立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人生哲学奠定了基础。

梁漱溟早年虽然没有像当时的留学生一样，有出国留学的经历，然而由于他身处京城，出身于满清官宦之家，其父梁济又有接纳新思想、新风气的胸襟，同样吸收到了西学的新鲜风气。当京城出现第一所中西小学堂，教授 A、B、C 时，梁漱溟便置身其中，读反映世界地理知识的《地球韵言》，读《启蒙画报》等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报刊。而对于当时学堂上人人必读的《三字经》和《四书五经》却不曾读过，这是当时一般学童难以具备的条件。这种最初相对开放的教育，无形之中在他幼年的心灵之中种下了西方文明的种子。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岁月里，只有十余岁的他便读了从日本传来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著名的报刊，以及当时新翻译出版的外来书籍。他沉浸其中，好像在上一个新的大学，接触到了最新的科技文化知识与东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早年对东西方文化的了解扩大了他的视野。

梁漱溟的思想来源比较复杂，有西方功利主义、生物进化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生命哲学，以及康德、叔本华、尼采、克鲁泡特金、罗素等人的思想，印度的佛教思想，中国儒家思想，中医的理论。他通过分析、对比、鉴别，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之中。梁漱溟曾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①这是指他从佛教思想转入儒家的思想基础。又说：“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仿佛有点看重自然，不看重人为。这个路数是中国的路数。”^②说明梁漱溟主要是融合陆王心学和柏格森生命派哲

① 《梁漱溟全集》第 2 卷，第 126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 《梁漱溟全集》第 2 卷，第 125 页。

学构建新儒家人生哲学。一是他吸收了陆王心学的泰州学派王艮（号心斋）提倡的“百姓日用即道”、“安身立本”，“直下便是，岂待旁求；一彻便悟，何容拟议？”^①的思想，认为不能打量计较太多，否则会迷失了人生方向，需要面对现实和当下，这是他由佛入儒，提出中国人不应走佛化之路的思想基础。他倡导孔子儒家的复兴，“实际上是按照泰州学派的观点改造过的儒学”。^②二是吸收柏格森生命派哲学的思想，建立人生哲学的生命本体论。他对于符合自己思想倾向的柏格森生命哲学情有独钟。他说：“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于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如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开始理会甚粗浅，但无粗浅则不能入门。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记得20年前，余购读柏氏名著，读时甚慢，当时尝有愿心，愿有从容时间尽读柏氏书，是人生一大乐事。”^③

柏格森以生命作为物质世界本源的概念深深影响了他。他从生命本源角度重新看待生活问题和人生问题，将人生之道看成生命之道，“道者何？道即是宇宙的大生命，通乎道，即与宇宙的大生命相通。……本来生命是盲目的，普通人的智慧，每为盲目的生命所用，故智慧亦每变为盲目的，表现出有很大的机械性。但在中国与印度则恰不然，他是要人智慧不向外用，而返用之于自己生命，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印度且不说，在中国儒家道家都是如此。儒家之所谓圣人，就是最能了解自己，使生命成为智慧的。普通人之所以异于圣人者，就在于对自己不

① 《王东崖先生遗书》。

② 李道湘：《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第9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26页。

了解，对自己没有办法，只往前盲目的机械的生活，走到那里是那里。儒家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便是表示生命已成功为智慧的，——仿佛通体透明似的”。^① 将人的生命与宇宙大生命看作是一个整体，以此解释人生哲学上的各种问题，这是传统儒学和陆王心学所不具备的思想。以此阐释孔子和儒家人生哲学思想，认为这就使人生的安身立命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理想人格实现问题得到了落实，从而形成了梁漱溟生命化的人生哲学。这就像陈独秀运用唯物论和唯物史观、胡适运用实验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一样，也有了自己的理论根据。

其次，梁氏以自己对生活和社会的感知，对当时社会时事的开放了解，比较深刻体会到了民国初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危机，尤其是人生信仰危机，思想经历了几次艰辛而复杂的转变和人生价值取向及人生信仰的选择，终于选定儒家思想作为人生哲学的基础。他自己说：“我常常说我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三期，其第一期便是近代西洋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② 正是有了前两次的思想经历和选择，才使他真正认识到了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使他能最后一次坚守儒家思想的思想阵地。

梁漱溟早年信奉功利主义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受其父梁济的影响。其父虽是清朝官员，却是忧心国事而主张维新的人，认定中国的积弱和近年来历次国难，全为文人所误，而西方所以富强是处处尚实的结果。其父的遇事以是否实用的功利主义标准深刻影响了他对人生世事的观察。当时他认定“人世间的是非善恶必在利害得失较量上求得其最后解释。这恰与近代西洋人——特如

① 《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29页。

②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590页。

英国的边沁、穆勒——的人生思想相近。”^① 功利主义认定人们的行动都是有意识的，都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的。是肯定欲望而跟着欲望走的。受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导引的少年梁漱溟在上中学时即讨厌传统学问之课堂灌输，只是迷于关涉时事的自学，“抱一种狭隘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②

正因为这种功利主义的引导，他开始参与当时的革命斗争。从赞同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转向革命，参加了京津同盟会。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剪去发辫，表示他与旧王朝决裂的决心。在参与同盟会，任《民国报》外勤记者期间，了解到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社会阴暗面，使他感到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种反差使他充满了对人生的迷惑。他曾几度想自杀，上述民国初年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在他身上有突出的表现。他开始隐居家中，通过阅读书籍寻找精神的归宿和人生的新方向。他因激愤于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现象而倾向于社会主义，但终因纠结于对人生苦乐问题而投入了佛教的怀抱。他自己叙述信仰佛教的原因说：“一、感情真挚易多感伤感触，佛家所谓烦恼重。二、事功派的夸大心理易反动而趋消极。三、用思太过，不知自休，以至神经衰弱而神经过敏。”^③ 于是不再讲实利，发生厌世思想，而根本否定世俗人生，拒绝婚姻，希望出家当和尚。

但梁漱溟并没有忘却对现实的关注，因此他想出家当和尚的意念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使他最终放弃出世之路，重新入世，由佛入儒。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他受到蔡元培的邀请，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开始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高一涵、陶孟和朝夕相处，然而“兹数先生即彼时

①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590页。

②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2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③ 《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8页。

所谓新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对东方文化的。我日夕与之相处，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我对于儒家思想之了解系先前之事，而思想转变由佛家而儒家则在此时之后也）。我应聘之前，即与蔡陈两先生说明，我此番到北大，实怀抱一种意志一种愿望，即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出气二字或不甚妥当）”。他对当时的西化现象，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批判“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严重，问题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决的道路不可。”^①引发了他的争强好胜心，为传统辩护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使命和责任也促使他构建一套理论，由此得到了人生的充实感，出世之念自然淡化了。

二是1918年11月10日其父梁济自杀，使他彻底放弃出世之路，回到世间来。梁济有感于当时国家危难，西学盛行，儒学被抑，道德沦丧，国将不国，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便以自杀表明自己对时局的态度。梁济自杀在当时引起了强烈震动，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对梁济自杀是殉清还是殉道，是道德还是不道德展开了讨论。而对于梁漱溟而言，则受刺激颇大。他在《桂林梁先生遗书》的《思亲记》中说：“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寤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轻率言之，无有一当。则公之见背既三年矣。顾可赎哉！顾可赎哉！”^②说明他对于自己违背父亲的意思，早有一种负疚感；父亲的自杀和殉道精神在他心灵上引起强烈震撼，由负疚而觉负罪。他虽然敬佩父亲以身殉道的精神，但并不赞同父亲坚信不移并为之献出生命的那个“道”。然而，

① 《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2页。

② 《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94页。

其父自杀却促使他关注和研究中国的儒家思想，“在先父辞世后一二年间我即转变，由佛家思想转变到儒家思想”。^①实际上，在这之前，他专任印度哲学和唯识学讲席，就开始渐渐属意于孔家思想，并刊载启示，征求同好，对儒家聚众研讨。他处于一种“好揽世间之务，抛出世修养”的两难境地之中。他1918年11月5日在孔子哲学第一次研究会上描述这时的思想矛盾说：“年来生活，既甚不合世间生活正轨，又甚不合出世生活正轨，精神憔悴，自己不觉苦，而实难久支，一年后非专走一条路不可也。”^②在这次演讲几天后，他父亲自杀。

促使他弃佛入儒的内在机缘，是他在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发现儒家人生哲学与他信奉的佛家人生哲学的不同：“当初归心佛法，由于认定人生唯是苦（佛说四谛法：苦、集、灭、道。），一旦发见儒书《论语》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苦字，而乐字却出现了好多好多，不能不引起我极大注意。在《论语》书中与乐相对待的是一个忧字。然而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以忘忧’，其充满乐观气氛极其明白；是何为而然？经过细心思考反省，就修正了自己一向的片面看法。此即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由来，亦就伏下了自己放弃出家之念，而有回到世间来的动念。”^③而促使他彻底放弃佛家出世的契机则是1920年春，应少年中国学会邀请作宗教问题讲演后，在家补写其讲词，他原以为这是容易的事，但却思路窘涩，头脑紊乱，随手翻阅《明儒学案》，于自己素来所熟悉的“东崖语录中忽看到‘百虑交铄，血气靡宁’八个字蓦地心惊：这不是恰在对我说的话吗？这不是恰在指斥现时的我吗？顿时头皮冒汗，默然

① 《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0页。

② 《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550页。

③ 《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698页。

有省。遂由此决然放弃出家之念”。^① 这有点禅味的故事说明他觉悟到自己的顾虑太多，计较太多，妄想而不切实际，造成了自己的人生信仰危机。梁漱溟的思想转变过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如果说由功利主义转入佛学一路，是梁漱溟思想的消极退隐，被动抗世，那么由佛转儒，可以说是梁氏思想的向上提升，由消极抗世到积极应世；由回避现实到面对现实。这是一种理智的成熟，也是一种理论的成熟。虽然他一再申述和说明佛家生活的可亲可爱，一再论证佛家生活的正确性，他愿意过佛家的生活，但出于对现实的关注，他又不得不放弃自己倾心的佛家生活而过儒家孔子的生活，因为他自觉地承担起拯救世人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当初转入佛学一路也是为众生‘拔诸疑惑烦闷’，转入儒学也非出于一己之好。”^② 尽管有学者指出梁漱溟在文化观上有多元的价值取向的倾向，^③ 有的学者指出梁漱溟的人生哲学有佛儒互融，以佛证儒、出入佛儒、出而不出、不出而出的儒佛双重性的特点，^④ 但从关注现实看，梁漱溟确实是以儒学为根基，以生命哲学为理论依据，以佛学为旁证理论，构建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因为这经过了他的艰苦选择和生命体验。

再次，是因为他始终将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作为自己的终身关怀，始终关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关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晚年在回忆自己的人生历程时说：“回到我思索、探求的中国与人生两大问题上，促成我的实际行动的，如中国问题占了上风，我则参加辛亥革命，当新闻记者，进北大教书等等；如人生问题占了上风，我便不结婚，吃素，想出家。这两大问题在我身上始终

① 《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699页。

② 李道湘：《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第86页。

③ 曹跃明：《论梁漱溟的多元文化观》，《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1期。

④ 参见龚建平：《略论梁漱溟人生哲学中的儒佛双重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